

暨南史学丛书



嬗变之境：

晚清经济与社会研究疏稿

刘增合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暨南史学丛书



嬗变之境：

晚清经济与社会研究疏稿

刘增合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嬗变之境：晚清经济与社会研究疏稿 / 刘增合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 - 7 - 5203 - 0656 - 0

I. ①嬗… II. ①刘… III. ①中国经济史—清后期—文集②社会发展史—中国—清后期—文集 IV. ①F129.52 - 53②K25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406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芳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5
插 页 2
字 数 358 千字
定 价 9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暨南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经费资助丛书

出版序言

踏入晚清史研究这个领域，一晃已是二十年了。其间经历的起伏波折不在少数：开端数年，研究选题忽东忽西，缺乏重心；研究文献受制于胶东一隅的收藏局限，不敷征引的情形十分明显；更重要的是由其他学科挤进这个新领域，专业训练欠缺导致学术先天不足，居边缘，无师承，欠资源，少对话，举步彷徨。这是初涉晚清史研究领域时不得不经历的一段摇摆旅程。这种踏足一晃数年，幸赖痴心始终如一，笨鸟先飞，由晚清理念思想层面，辗转到舆论社群领域，掠影式的研究，即席式的讨论，虽缺乏根底和深度，但却触及晚清历史发展的一些或突变或渐变的浪花，骨架虽未窥透，但肌肉大致可观，底色未足浓描，然附着色彩近真揭示出来。

本书收录的论题有三个部分，始自“思想与观念”，继之“舆论与社群”，终于“制度与体制”，主旨在于瞩目晚清社会与经济领域一种“嬗变之境”发生、衍变的走势，大致反映了本人踏入晚清史研究后，先后研究的兴致所在，其中，最后一个主题，与本人当下研究较为接榫，属于承前启后的学术思考，因未纳入相关论著，故而收进此书。以今日境界，回溯当初，幼稚当然难免，而涉足的论题却屡屡引起学界关注，抱愧之下，且有欣慰。结集出版，既反映自己初始阶段的学术旅程，砥砺未来前行的意志，又期望相关课题或有继起同侪追踪潜研，提供一种视野或见解，冀其超越吾辈，更有创获，俾能推动或拓展这些研究领域向纵深迈进。

目 录

出版序言	(1)
------------	-----

思想与观念篇

咸丰朝经世学派与近代地理观念的演进	(3)
-------------------------	-----

- | | |
|---------------------------|------|
| 一 世界中心主义理念与经世学派的重兴 | (3) |
| 二 睁眼向洋第一步:世界地理的近代关注 | (7) |
| 三 制夷主题中的价值索论 | (12) |

咸同光三朝晚清外交观念的演进	(15)
----------------------	------

- | | |
|-------------------------------|------|
| 一 地理观念的转换:促动外交观念演进的重要因子 | (15) |
| 二 外交理念:从夷务到洋务 | (17) |
| 三 外交战略:从商务羁縻到商战抗夷 | (20) |
| 四 外交原则:从以夷制夷到均势、结盟理论 | (24) |

晚清“鸦片商战”观念与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	(27)
-------------------------------	------

- | | |
|-------------------|------|
| 一 鸦片商战言论的萌生 | (27) |
| 二 以土抵洋观念的形成 | (31) |
| 三 商战的成效与恶果 | (36) |

近代绅商与经济伦理观念的变迁	(41)
----------------------	------

- | | |
|------------------------------|------|
| 一 近代绅商互渗的社会学检视 | (41) |
| 二 绅商互渗:经济伦理观念的制约与促动 | (45) |
| 三 近代经济伦理观念的演进:绅与商的价值估价 | (49) |



儒道与治生之间:儒家经济伦理观念中的对峙与融通	(53)
一 儒家经济伦理观念的梯级差序	(53)
二 差序格局中的紧张与对峙	(56)
三 对峙中的融通与转换	(61)

儒家经济伦理观念“差序格局”界论	(68)
一 论题因由	(68)
二 “差序格局”的范畴和语境	(71)
三 经济伦理观念的序化形态	(73)
四 差序格局的一个诠释:以日本早期文明为例	(78)

舆论与社群篇

大众媒介与晚清时期公共舆论的扩张	(85)
一 公共领域·公共舆论·媒介	(85)
二 批判性舆论空间:大众媒介的崛起与政治疏离	(88)
三 排拒与固守:公共舆论与晚清政权互动性质透视	(94)

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	(98)
一 “商会—市民社会”研究趋向的检讨	(98)
二 晚清大众媒介:规模·结构·内容转向	(102)
三 辅助媒介:近代文化和公共舆论扩展的中介因素	(110)
四 近代媒介文化视野中的社会与国家	(114)

近代组织传媒与晚清公共舆论的扩张	(122)
一 传播媒介:一种市民社会发育程度的分析工具	(122)
二 组织传播媒介、晚清公共舆论扩张的重要酵母	(124)
三 组织传播媒介视野中的社会与国家	(132)

西方传教士与20世纪初期的国民性问题	(136)
一 在两难与争论中抉择	(136)

二 开民智播睿知的独有视界	(138)
三 在民族觉醒和社会变革中的价值摧升	(144)
20 世纪初趋新社群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	(146)
一 趋新概念界定与趋新社群涌现	(146)
二 益新民智与鼓化文明：国民性问题的视界	(149)
制度与体制篇	
“常”与“变”：光绪前期清理州县积亏及制度因革	(159)
一 清亏肇因	(160)
二 整饬纲纪	(165)
三 制度因革	(170)
商务局与清末工商产业的行政整合	(177)
一 商政改革的言论	(177)
二 商务局的职责定位	(180)
三 旧制掣肘	(185)
地方游离于中央：晚清“地方财政”形态疏证	(189)
一 咸同就地筹饷与地方财政的萌生	(190)
二 外销财政与地方财政规模	(197)
三 两税划分时期的地方财政意识	(200)
日本税制与清季税制革新	(207)
一 日式税制的受容	(208)
二 奉天税政改制之案例	(211)
三 广东杂捐杂税改制之案例	(218)
巡视督查制度与清季财政转型	(225)
一 从个案操作到制度启动	(226)
二 巡官授权	(234)



三 驻省督查	(244)
四 巡查成效与环境制约	(254)
辛亥前后财政改制的环境与制度传衍	(262)
一 改制环境	(262)
二 制度传衍	(265)
清末禁烟谕旨起因论	(272)
一 唐绍仪作用的认定	(277)
二 汪大燮六月初奏折的讨论	(282)
三 传教士杜布斯联合请愿书的影响讨论	(289)
清季的鸦片专卖	(293)
一 借镜其他国家和地区	(294)
二 各部态度	(300)
三 度支部梗阻	(305)
四 督抚再争	(315)
清末外省的鸦片专卖	(320)
一 江苏:两种专卖模式的波折	(321)
二 福建:绅商积极介入	(327)
三 山东:筹款导向的专卖行动	(330)
征引文献	(335)

思想与观念篇

咸丰朝经世学派与近代 地理观念的演进

世界地理学观念进入中国近代早期人们的思想视野应该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此后 20 年间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初创时期。这种观念的价值在于首先由地理层面，然后延伸至该国的史志、政治、科技、工商、矿政等，它理应算是近代中国人西学架构中的原初因子。近代早期的世界地理关注，直接地受惠于经世学派的促动和思想支配。

一 世界中心主义理念与经世学派的重兴

19 世纪早期，中国人关于世界地理的观念基本上是模糊的，大致停留在“以我为中心”的认识阶段。早在战国末年，齐人邹衍所持“九州”说即大体上表现出这种“世界中心主义”理念，《史记·邹衍传》载：“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数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①

关于世界各国地理分布情况，中国古籍中言及四方邻国者较多，诸如《史记》《汉书》等均有记载，但几乎未能逾越亚洲的范围，至于西方诸国的地理人文观念几近阙如。就 19 世纪欧洲列强的资料而言，情

^① 《孟子列传第十四》，韩兆奇《〈史记〉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3 页。



势更甚。这方面的书籍多来自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是第一位将 16 世纪的地理新发现介绍到中国的人，但他所讲的五大洲之说，却难以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认可。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撰《总目提要》，对利玛窦所述五大洲之类居然表示怀疑，因为它“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多奇异，不可究诂，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①。

其实，在那个时代，群臣大多“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在学术环境方面也是尚空谈，轻务实。所以，即便是有了解世界地理人文知识的机会也痛惜地放弃了。美国的赠书曾为耆英谢绝，法国的留学又让黄恩彤婉拒。俄国政府因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赠各类图书 355 种，共计 800 余册（幅），另有天文、地理仪器和工具，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艺、地理等，仅地图就有 22 幅，另有地图册 13 本。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原因是“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②。可以说，在 19 世纪 40 年代前，由国人自己所撰的地理类书仅有 3 部：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1730 年版）、王大海的《海岛逸志》（1760 年版）、谢清高的《海录》（1820 年版）。难怪中英开战后，道光皇帝尚不知“英吉利”位于四大洲的哪个角落。世界自然地理观念如此匮乏，人文社情更是未能知晓。鸦片战争前后，有一个文人汪仲洋以诗作描述英国人：有鹰钩鼻子，猫眼睛，红色的络腮胡子和头发，他们的长腿不能弯曲，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碧绿的眼睛畏怯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③ 两江总督裕谦多次明确地描述英国人不能弯曲腰身和两腿，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④

在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区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句话，经常被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其实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所能看到的世

① 钟叔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2—43、48 页。

② 《郭嵩焘日记》第 1 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87 页。

③ 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191 页。

④ 《史料旬刊》第 38 期，故宫博物院 1930 年版，第 399 页。



界，即“天下”，长久地局限于东亚一带。中华文明长时期在东亚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积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即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蛮夷之邦”的三重关系。对于西方诸国，官方文书中蔑称其为“夷”，并在其国名旁加“口”字旁，如英、法、美三国，分别称其为“唎夷”“睇夷”“咪夷”。除国名外，当时在西方的人名、船名也加“口”字旁。从某种意义上讲，“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清朝傲视“四夷”的“天下”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性，也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16世纪西方人初至，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17、18世纪之交，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盛世；即便是在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之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仍不低于西方各国，生产总量则远远超过之。至于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确实是落后了。但是由于傲视的惯性和文化上的巨大落差，中西通商200年后，中土的官僚士子们并未折服西方，反而坚信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19世纪之前，不仅中国士人自认为中国是世界事务的中心，即便是17—18世纪来华之天主教耶稣会士在欧洲造成的印象，也认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①。但是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使西人自信心与日俱增。到18世纪50年代，他们只承认中国文化优于周边国家许多，却已逊于任何基督教国家了。^②但中国士人更强调中华文化、政治、经济的天下中心位置。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的优越感使得他们并不特别需要了解全球，特别是被视为“蛮夷”的西方诸国的地理、人文和经济，即便是与之通商，那也是“天朝”施之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这就不难理解，1793年、1826年英国先后遣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来华，清政府依照“天朝”制度，将其当作“咭贡使”来接待，结果不欢而散。1834

^① Arthur O. Lovejoy, *The Chinese Origins of a Romanticism*, in *idem*,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1960, pp. 99–135.

^② *Chinese Repository*, III. 8, Dec. 1834, p. 379. Eliza G. Bridgman, 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1864, p. 216.



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派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为驻华商务第一监督。负责通商事务的两广总督卢坤，未究诘其来华目的，却震怒于以“平行款式”递交的文件。^① 1838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投递文书的封面上无“禀”字样，两广总督邓廷桢即“原封掷还”^②。尽管1834年之后，英国有了官方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称为领事），但清政府并不承认其官方地位，仍将其当作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来看待。^③

近代初期，西学观念的懵懂状态与当时学术导向的空疏、烦琐是相关联的，无论是汉学、宋明理学，还是以桐城派为代表的词章之学，都是脱离实际、空泛无聊的学问，八股取士的标准和导向也囿于斯。“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④ 政治如此，思想形态更甚。空泛、务虚的旧有学术状态、思想现状确实走到了历史的死途，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预示了它的末日，而一批出身中小地主阶级的士人，起而力求匡正，由此，19世纪出现了对于“经世致用”重感兴趣的现象，随即推展出近代初期学术思想阶层的经世学派。

重新受到关注的经世思潮，强调社会实践和入世的重要作用，其目标既指向中世纪理学所崇尚的玄学思辨，认为它“空”；另外，它也认为考据学著作的迂腐无用。程朱理学只能“以晏安鴆毒为培元气，以养痍遗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汉学脱离实际则表现为烦琐的考据、训诂，“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经世学派曾于17世纪名噪一时，但是主要由于乾隆帝的镇压政策，时至18世纪为经院学派所取代。^⑤

学术与政局相因应。19世纪40年代启动了近代中国的大变局，经

①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168页。

② 同上书，第329—331页。

③ 同上书，第223页。

④ 陈旭麓：《道光是怎样一个皇帝》，《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19—722页。

⑤ 关于清代学派的材料，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较多的叙述。



世学风在这一时局的促动下逐渐成为显学。经世学派的运脉在于主张通经致用，反对空谈不实。开湖湘经世之先河的胡宏曾说：“务圣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见，方力行以终之。”^①时至清道光年间，贺长龄、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对学术思想界的经世之风产生深远影响。在此书序言中，魏源等阐明了经世学派的两个基本态度，即强调现实和致用的重要性，反对“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空疏心性之学，主张学术与现实密切结合。嘉道以还，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湖南经世学派崛起，湖南成为经世学派的大本营，其地位诚如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下）中所说：“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也。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②沐浴经世之风、致用之雨的经世学派，无论其个人的经历、地位、个性、智力乃至生活方式是如何相似或不相似，他们之间的思维、情感、倾向和行动，均表现出一种“心理同质性”，即面向现实和着意实效。正是这一经世务实的文化性格，使得“世界中心主义”“中心王国”的地理学观念开始解析、坍塌，新的变奏也就孕育其中。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中国近代思想界的演绎即始于斯。

二 睁眼向洋第一步：世界地理的近代关注

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经世学派关注的焦点是国内时局问题的务实性改革。这个时期清朝国势已逐步迈入衰弱之路，当时兴起的白莲教起义更是给颓弱的国势和清朝政权以沉重的打击。经世学派关注的问题涉及镇压起义的方法和漕运、盐税全面改革等。

但是，随着西方列强对东南沿海侵扰的增加，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经世学派瞩目的焦点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内政问题转为关心“夷

^① 胡宏：《知言》第1卷，参见赵宗正、李曦等编《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三（唐宋元部分）》，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34页。

^②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47页。



国”“夷人”的有关情况。著名的经世派人物包世臣早在1826年就有过预感，英国不久将从沿海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并关注海防问题的紧迫性。那时撰述的海防著作大多将注意力移向广东沿海一带。鸦片战争之前的1836年，著名的军事将领关天培曾编辑了《筹海初集》。战后，梁廷枏、俞昌会和李福祥也曾在海防问题上提出了重要的见解。^①实际上，关注海防与了解擅长海战的西方国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比之下，经世派人物更注重“知夷情”“通夷闻”。通晓途径便是由翻译西报来达成“知夷”目标。还在1839年时，林则徐曾在广州命令翻译外国报纸，^②并上奏建议设立一个官办译局。郭嵩焘在1859年奏请设立一个教授外语的官办学堂。^③除报纸外，西方的地理、历史、法律和政治方面的资料都被看作是了解夷国情势的重要途径。在如上资料和著作中，具有初始价值和影响较大的要算是经世派人物所做的对世界地理的关注，这应算是近代中国人睁眼向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奠基性工作。

应该说，进入19世纪以后，以经世派为代表的晚清社会有识之士已经对皇朝的闭关政策颇有微词，他们希望能够了解夷国现状，单凭古书中那些“得之传闻无可验证，文人藻绩华而鲜实”的述奇志异之作根本无法满足。1840年，“天朝大国”与“日不落帝国”开启战争，英国的大炮轰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大门，如此，才“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④，这种接触始自经世学派对世界地理的近代关注。

首先应该提到的声名较小但是却有着早期影响的世界地理著作，当算是谢清高的《海录》，“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自谢清高始”^⑤。谢清高为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18岁时，从商人走海

①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491、535页。

② 参见《澳门新闻报》《华事夷言》，载《鸦片战争》第2册。

③ 郭廷以等编：《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第132—134页。

④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0页。

⑤ 《嘉应州志》卷3，吕调阳《重刻〈海录〉序》。实际上，中国人亲历泰西留下的中文记述，当以樊守义《身见录》为最早，只是由于其埋没不彰，《海录》方为史家看重，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44页。